

诗话概说

刘德重

张寅彭 著

I207.22

560

2

B608.126

诗 话 概 说

刘德重 张寅彭 著

中 华 书 局

753617

责任编辑：孙通海

296

诗 话 概 说

SHI HUA GAI SHUO

刘德重 张寅彭 著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兴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 9 1/2印张 · 223 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800册 定价：5.75元

ISBN 7 - 101 - 00619 - 1 / I · 91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诗话的范围..... 1
- 第二节 诗话的种类..... 2
- 第三节 诗话的渊源..... 6
- 第四节 诗话的价值.....12

第二章 宋诗话

- 第一节 诗话的产生及早期诗话.....17
- 第二节 苏黄诗风与北宋后期诗话.....23
- 第三节 江西诗说的发展与南宋前期诗话.....39
- 第四节 《沧浪诗话》与南宋后期诗话.....58
- 第五节 宋代的诗话汇编.....71

第三章 金元诗话

- 第一节 金代诗坛与《滹南诗话》.....86
- 第二节 元代诗话.....91

第四章 明诗话

- 第一节 明初与明中叶诗话..... 102
- 第二节 明中叶以后的诗话..... 113
- 第三节 明代的诗话汇编与诗话丛书..... 148

第五章 清诗话

- 第一节 唐宋诗之争中的清初诗话..... 156
- 第二节 康熙、雍正时期的诗话..... 179

第三节	集古典诗学大成的乾隆、嘉庆时期诗话·····	203
第四节	晚清暨近代诗话·····	229
第五节	清代的诗话汇编和诗话丛书·····	253
〔附〕	历代诗话要目·····	267
后记	·····	295

第一章 绪 论

诗话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特有的一种形式，在宋以后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我国古代的诗话著作是相当丰富的，流传至今的约有数百种之多。对这一笔十分可观的诗学遗产，我们应当加以整理和研究，给予一定的历史评价。这也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一节 诗话的范围

诗话是一种用笔记体写成的、兼具理论性质和资料性质的诗学著作。它所以称“诗话”而不称“诗论”，是因为它比起严格的诗论来，内容要广泛得多，形式要灵便得多。“在轻松的笔调中间，不妨蕴藏着重要的理论；在严正的批评之下，却多少又带有诙谐的成分”（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这是诗话论诗的一个显著特点。

由于诗话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严格的要求，因而它的界说并不那么分明。为了便于论述，我们需要给它确定一个大致的范围。

一是时间的范围。诗话作为正式名称的出现，始自北宋中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宋以前的一些诗学著作，如南朝梁锺嵘的《诗品》、唐释皎然的《诗式》等，虽然有些诗话丛书也予以收录，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们还不能算是正式的诗话，与宋以后的

诗话著作应有所区分。

二是形式的范围。我国古代诗学著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诗话外，还有许多重要的诗学见解散见于大量的序跋、书信、诗作、论文以及选本中。它们在形式上都与诗话有明显的不同。至于有些选本兼收诗和诗评，则需要根据其主要倾向来确定归属。如宋蔡正孙的《诗林广记》，着眼点在辑集诗评，选诗服从于辑评，所以可视为诗话汇编。明高棅的《唐诗品汇》，虽也有少量评语，但着眼点在选诗，所以仍应视作选本。《四库全书总目》将后者归入“总集类”，将前者归入“诗文评类”而指出其“体例在总集诗话之间”，是很正确的。

三是内容的范围。单从形式上看，一般诗话与笔记并没有多大差别。有些诗话本身就是从笔记中辑录出来的。但从内容上说，则诗话必须以说诗为中心，笔记便没有这样的限制。《四库全书总目》把诗话列入“集部·诗文评类”，把笔记列入“子部·杂家类”，正是从内容总体上加以划分的。因此，对于笔记中有关说诗的内容，已经辑出单行者，可以视为诗话；而未经辑出单行者，则只能仍视作笔记。

自然，上面所说的范围，都是相对的。我们谈论诗话，可以大致限制在这些范围内，但也不必过于拘泥。

第二节 诗话的种类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曾把历来的诗话分成两大类，即“论诗及事”类和“论诗及辞”类，也可简称为“论事”类和“论辞”类，所谓“论诗及事”，是指对诗人诗事的记述，重在资料性；所谓“论诗及辞”，是指对诗人诗作的研究，重在理论性。近人罗根泽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也说：“诗话有两种作用，一为记事，一为评诗。记事贵实事求是，评诗贵阐发诗理；前者

为客观之记述，后者乃主观之意见。”他所说的两种作用，正与章学诚所说的两大类相应。不过这两者之间，也没有绝对的界限。正如郭绍虞所说：“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宋诗话辑佚序》）多数诗话是兼而有之，带有综合性的。

前人对于诗话的具体内容，还作过更进一步的归纳。如宋代许颢在《许彦周诗话》中说：

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他所说的“辨句法”、“正讹误”，大体属于“论诗及辞”的范围；“纪盛德”、“录异事”，大体属于“论诗及事”的范围；“备古今”可能兼及论辞和论事。由于许颢的时代较早，他所作的归纳还是不够全面的。清代锺廷瑛在《全宋诗话序》中说：

诗话者，记本事，寓评品，赏名篇，标隽句；耆宿说法，时度金针，名流排调，亦征善谑；或有参考故实，辨正谬误；皆攻诗者所不废也。

这里列举的内容，涉及记事、批评、鉴赏、标句、说法、调谑、故实、纠谬等方面，大致把诗话的主要内容全都囊括进去了，只是仅作罗列，未作分类归纳。此外，如《四库全书总目》在“诗文评”类的序论中把历来的诗文评分为“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者、“第作者甲乙而溯厥师承”者、“备陈法律”者、“旁采故实”者、“体兼说部”者五类，日人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说》中又将其敷衍为“品评作品者”、“记载关于作品之故实者”、“论文学之体者”、“讲说文学之理论者”、“系统的论述者”、“随笔的杂录者”六类，虽然所说不限于诗话，而且前面从内容上着眼、后面从形式上着眼，划分标准不统一，但对于我们给诗话分类，也还是有启发作用的。

参考前人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将诗话的内容作如下的划分：

(一)“论诗及辞”类:

1.谈理论:对诗歌创作和发展中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总结,提出自己的诗学主张和见解,以及与不同的诗学观点进行辩驳论争等;

2.寓品评:对前代或当代诗人诗作进行分析、评价,指出其风格、成就、地位及前后继承关系,品第高低,比较优劣,标举隽句,提出批评性或鉴赏性的意见等;

3.述体变:对各种诗歌体制或诗歌流派的形式、发展、演变进行探究,溯源辨流,阐说它们在内容、形式各方面的特点及要求等;

4.讲法式:对诗歌的格律、声调、音韵、对偶、造语、用事等艺术技巧问题加以研讨,提出一定的作诗法则或规范等;

5.作考辨:对诗歌的创作背景、命题立意、典故出处、字句来历以及所涉及的名物制度、风土习俗等进行考证诠释、辨误纠谬,旁涉训诂、校勘等。

(二)“论诗及事”类:

1.记述诗歌本事;

2.记述诗人轶事;

3.记述与诗有关的各种资料及见闻等。

如前所述,就一部诗话来说,其内容往往并不是单一的,很难截然归入某一方面中去。但通过这样的分类归纳,我们便可以对诗话广泛而庞杂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不至于茫无头绪了。

再从形式上来看,诗话的基本形式是诗话体。所谓诗话体,其实就是笔记体。正如郭绍虞所说:“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论事则泛述闻见,论辞则杂举隽语,不过没有说部之荒诞,与笔记之冗杂而已。”(《宋诗话辑佚序》)这种诗话体的主要特点是:随

笔漫录，分则札记，笔调轻松活泼，文风亲切平易，娓娓叙谈，可长可短，通常一则就是相对独立的一段，前后既不需要衔接连贯，也没有一定的排列次序。总之，它在形式上是极其灵便的。

用诗话体来写诗话，原不讲究结构体系，但也有一些诗话，把相近的内容归聚在一起，或按诗人、或按诗体、或按时序、或按性质作一定的编排，这样看上去就有了一个大致的系统。如《沧浪诗话》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就构成了一定的体系。一些诗话汇编也多分门别类，加上标题，以便查阅。这些，便与一般的笔记不同了。

诗话著作在形式上还有一些特例。如前已述及的《诗林广记》接近于选本，清叶燮的《原诗》内篇接近于论文，赵执信的《声调谱》接近于图谱，赵翼的《瓯北诗话》竟至于夹入一卷“陆放翁年谱”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诗话的特殊形式。

由此看来，按照诗话的形式，又可以作如下的划分：

(一)基本形式（诗话体）：

- 1.无系统者（分卷分则，随意编排）；
- 2.有系统者（分门别类，标纲立目）。

(二)特殊形式：

- 1.近于选本、论文、图谱者；
- 2.杂以其他形式者。

诗话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大体看来，也不外乎这几种类型。

如果采用不同的标准，还可以对诗话作各种不同的划分。例如，从成书情况来看，有著者自撰的诗话，有后人辑录的诗话，后者中又有专辑一家的诗话如《东坡诗话》，有汇辑各家的诗话如《诗话总龟》。从评说的对象来看，有综论历代各家的诗话，有专评某一范围诗人的诗话，后者中又有专评某一代诗的诗话如《全唐

诗话》，有专评某一家或数家的诗话如《杜工部草堂诗话》、《李杜诗话》，有专评某一地域诗人的诗话如《全闽诗话》，还有专评妇女之作乃至某一地域妇女之作的诗话如《名媛诗话》、《闽川闺秀诗话》等等。这种专评性质的诗话，反映了诗话后来向着专门化方面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诗话的渊源

诗话的内容既然有“论诗及辞”和“论诗及事”两大类，诗话的形式诗话体又来自笔记体，因而推溯诗话的渊源，也就有这样两条线索：一是前代诗歌理论批评对它的影响，一是前代记事笔记对它的影响。

我国诗歌理论批评的发端，一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当时虽然还没有专门的诗学著作，但散见于一些典籍中的论诗、评诗、谈诗之语，已经带有理论批评的性质。因此，前人溯及诗话的渊源，往往把它们看作是最早的源头。如清代何文焕在《历代诗话序》中说：

诗话于何昉乎？赧歌记于《虞书》，“六义”详于古《序》，孔孟论言，别申远旨，《春秋》赋答，都属断章。

姜曾在《三家诗话序》中说：

吴札观乐，不废美讥；子夏序诗，并论哀乐：即诗话之滥觞也。

秦大士在《龙性堂诗话序》中说：

诗话之由来尚矣。“思无邪”，孔子之诗话也。“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之诗话也。

曾燠在《静志居诗话序》中说：

诗话何昉乎？孟子之论小弁、凯歌与云汉之诗，盖诗话之祖也。

所谓“赧歌”，是指《尚书·虞书·皋陶谟》中关于帝舜作歌、皋陶赧和的记载。所谓“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师》，后来《毛诗序》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旧说此序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其实是出自汉儒之手。所谓“《春秋》赋答”，是指《春秋左氏传》中所记当时外交场合赋诗酬答的情况，虽多属断章取义，但在记述诗事这一点上与后世诗话有相似之处。所谓“吴札观乐”，是指《春秋左氏传》中所记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并对乐工演奏《诗经》各部分所作的品评，这是对《诗经》最早的评论。而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孔、孟的论诗意见。孔子的“思无邪”说（见《论语·为政》），提出了评价诗歌思想内容的标准。孟子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说（见《孟子·万章上》），指出了阅读、鉴赏诗歌的方法。孔子、孟子还对《诗经》中的一些具体作品进行过评论或阐释。这些，都对后世的诗歌理论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们所采用的语录式文体和以三言两语发表诗学见解的方式，也与后世诗话不无相通之处。

然而，先秦的诗论，毕竟还只是零章碎简；到了汉代，才出现了《离骚传》、《毛诗序》那样的专门论诗、解诗的著作。因此，又有人把诗话的渊源溯至汉代。如清代陆圻在为毛先舒《诗辩诤》所作的序中说：

然则辩诗者何昉乎？语有之：“《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辩之始也。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就是西汉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中评论《诗经》的话。不过此传早佚，仅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尚存一斑。汉代最重要的诗学著作当推前已述及的《毛诗序》。此序有大、小之分，前引何文焕、姜曾所说的是《大序》，清汪沆在为杭世骏《榕城诗话》所作的序中则认为诗话源出于《小

序》:

予惟诗话之作，滥觞于卜氏（子夏）《小序》，至锺仲伟（嵘）《诗品》出更一变其体。

《小序》是对《诗经》中一首首诗歌主旨及背景的解说，颇类似后世所说的诗歌本事。日人青木正儿说，《大序》“论风、雅、颂之义”，属于“体论之例”；《小序》记“作品之由来”，属于“故实之例”。这正与后世诗话论辞和论事两种倾向相合。

毫无疑问，先秦两汉的诗论对诗话是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还比较间接，很难一一实指。与诗话关系更密切的是魏晋南北朝至唐五代出现的一些诗学专著和笔记小说，它们从理论批评和记事体制两方面都为诗话的产生直接开拓了道路。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文学理论获得高度发展的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对建安七子的品评，陆机在《文赋》中对艺术构思规律的描述，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对各种文体特点、源流的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学理论全面、系统的阐发，锺嵘在《诗品》中对五言诗的专门研究，都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批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值得提出来说的，是锺嵘的《诗品》。《诗品》在当时称作《诗评》，全书三卷，将自汉迄梁的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分别指出其师承渊源，概括其风格特点，评论其成就得失，有时也间及诗人轶事。其中许多重要的诗学见解如“自然”说、“滋味”说、“直寻”说、“文已尽而意有余”说等，经常为后世诗话所称引。它所开创的以品为纲、以人为目、逐一品评、自成系统的形式体制，虽与随笔杂录的诗话体有所不同，但对诗话从无系统趋于有系统、从漫无结构发展成较为严谨的诗学著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清代沈德潜在为乔亿《剑溪说诗》所题的诗中说：

诗家品彙，始于锺嵘，表圣（司空图）承之，续者仪卿

(严羽)。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也说：

诗话之源，本于锺嵘《诗品》。……《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何文焕也把《诗品》视为诗话的开山之作，收入《历代诗话》，他们都认为诗话是由锺嵘的《诗品》一脉承传发展而来的。

魏晋南北朝又是我国笔记小说开始形成的时期。当时出现了一些专门记载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最著名的就是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此书按所记内容分成三十六门，其中“文学”、“任诞”、“排调”等门都有一些关于诗事、诗论的记载。如曹植赋七步诗、阮籍求为步兵校尉、袁羊作诗调刘恢等，属于轶事一类；谢安、谢玄论《诗经》佳句、王恭与其弟论古诗佳句、潘岳评夏侯湛作“周诗”、阮孚赞郭璞诗等，则于记事中兼及评论。所以也有人将它视为诗话的开端。如清代方世举《兰丛诗话序》说：

晋谢太傅（安）问兄子玄：“诗以何句为佳？”玄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语，太傅举“讨谟定命，远猷辰告”二语，盖各道其将相襟怀也。然已开诗话之端。

《世说新语》中象谢安叔侄论诗的记载，无论从内容上或从形式上看，都已相当接近后来的诗话。比起《诗品》那样的专著来，它们分则记事，笔调轻松灵便，显然更直接地影响到诗话体的形成。

唐代的诗歌理论批评意见，多散见于各家别集和选本中。独立单行的著作，则多属诗格、诗式、诗句图之类。也有人把这一类著作视为诗话的滥觞。如清余成教《石园诗话》说：

（唐）顺宗时，僧皎然《杼山诗式》著偷语诗类，懿宗咸通时，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此后人诗话诗派之所由滥觞也。何文焕《历代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则除了皎然的《诗式》、张为的《诗人主客图》外，还收有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孟棻的

《本事诗》、旧题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五代齐己的《风骚旨格》。其中，《乐府古题要解》专门考释乐府古题，《四库全书总目·乐府古题要解提要》疑为伪作；《风骚旨格》通篇摘句，既乏理论，亦无记事；《诗人主客图》分中晚唐诗人为六派，各立“主”、“客”，“客”又分“上入室”、“入室”、“升堂”、“及门”数等，各摘若干诗句示例，也属诗句图一类。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诗式》、《二十四诗品》和《本事诗》。

皎然的《诗式》，约作于中唐贞元年间（785—804），今传有一卷本、五卷本两种。五卷本卷一总论诗歌原理及所举“诗有五格”中的第一格，以下四卷分论第二至第五格，各摘“名篇丽句”为例。论诗主张“真于情性”、“风流自然”，反对“声病”说，也不赞成用典，但不废苦思锻炼，这些都与锺嵘的《诗品》相近，其突出贡献，一是开始触及诗歌的意境问题，认为“情”、“意”应通过“境”、“象”体现出来，即所谓“假象见意”，并要求“取境”“高”、“逸”，表现含蓄，“情在言外”，“旨冥句中”，“但见情性，不睹文字”；一是论风格，标举十九体，各加扼要说明，如论“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论“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等等。这些见解，开了后来司空图、严羽一派诗论的先声。

司空图（837—908）的《二十四诗品》，一卷，亦简称《诗品》。所谓“品”，这里是指诗歌的品类，与锺嵘《诗品》对诗人进行品评不同。司空图把诗歌的风格、意境分为“雄浑”、“冲淡”等二十四品，每品用十二句四言韵语加以描述，其中充满形象的比喻，就象一首首优美的写景诗。这种别具一格的形式，后来为不少人所摹仿（如清袁枚写有《续诗品》、顾翰写有《补诗品》等），以致成为我国古代诗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司空图论诗，强调“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如论“雄浑”：“超以象外，

得其环中”，论“冲淡”：“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论“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都含有不落言诠而意境深远。余味无穷的意思，对后来的“兴趣”说、“神韵”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孟棻的《本事诗》，一卷，作于唐僖宗光启年间（885—887），专记诗歌本事，内容分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七类。其中如记王维刺宁王强占卖饼者妻作《息夫人》诗、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挤作《海燕》诗等；对于理解作品内容提供了宝贵的背景资料。有些记载如破镜重圆、红叶题诗、人面桃花等，富有传奇色彩，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也有些记载失实，如骆宾王为宋之问续《灵隐寺》诗、李白嘲杜甫作“饭颗山头”诗等，前人已辨其讹。《本事诗》并不涉及诗歌理论批评，就其性质而言应属笔记小说，但它专记与诗有关之事，又大类诗话，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也列入“诗文评”类。唐五代还有一些笔记小说如《朝野僉载》、《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唐摭言》、《云溪友议》、《北梦琐言》等，其中也载有不少有关诗人诗事的资料，多为后世诗话所称引。所以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指出：

唐人说诗之著多诗格与诗法，或则摘为句图，这些都与宋人诗话不同，只有孟棻的《本事诗》、范摅的《云溪友议》之属，用说部的笔调，述作者的本事，差与宋人诗话为近。

可见《本事诗》一类著作，比起诗格、诗式、诗句图来，更接近于诗话。后来的诗话正是直接从唐、宋这一类著作中脱胎而来的。

综上所述，在诗话正式形成以前，我国古代的诗学传统已经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归纳起来，不外这样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从先秦著作中的论诗之语到《诗大序》、到《诗品》、到《诗式》、到《二十四诗品》等论诗著作，一是从先秦著作中有关诗事的记述到《诗小序》、到《世说新语》中有关诗人言谈轶事的记述、到《本事诗》以及唐、宋含有谈诗内容的笔记著作。前者对诗话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理论批评方面，后者对诗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随笔记事的性质及体制方面。诗话，就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

第四节 诗话的价值

关于诗话的价值和所起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过去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就是所谓“诗话兴而诗亡”。例如，元代就有人说过：“诗话盛而诗愈不如古。”（赵文《青山集·郭氏诗话序》）明代李东阳也说：“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于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怀麓堂诗话》）清代吴乔则说：“唐人精于诗而诗话则少，宋人诗劣于唐而诗话乃多。”（《答万季野诗问》）直到民国年间还有人說：“诗话之作，唐以前无之；而唐以前之诗，莫不近古。自诗话杂然并出，异论朋兴，学者惑焉。”（严伟《清诗话序》）他们都认为诗话于诗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建筑在尊唐贬宋的基础上的，由对宋诗的否定而归咎于宋代诗话的兴盛，把诗话当成了替罪羊，对此，不少学者作过批驳。如清代锺廷瑛指出：

宋人诗十倍于唐，宋人之为诗话，其倍于唐也不可以数计。……为高论者曰：“诗话兴而诗亡。”岂其然哉！（《全宋诗话序》）

日人近藤元粹也指出：

诗话之著，唐人已有焉，至宋最多，而唐宋善诗者如此其盛也。元人著诗话者无几，而其时果有诗人乎？（《萤雪轩丛书自序》）

今人郭绍虞进一步指出：

后人每说唐人不言诗而诗盛，宋人言诗而诗衰。其实不然，唐人不是不言诗，而欧阳修的《诗话》，正是在唐人论诗著作上提高一步的。（《清诗话前言》）